

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罪行不会被遗忘

玉雕随想

汪永基

相传在明代古城岫岩的文人圈儿中，有人出重金求一副对子的下联。其上联是“岫岩山，山山出玉”，字字见山伴玉。出上联者或引“才子佳人”，或“招贤选婿”，或“争比文韵”。前往补对子者曾自信满满，锋芒毕现，口吐莲花。然而，500多年飘然而过，至今仍无佳对。后来人但愿这只是个酸酸的段子。

日前，新时代巨型玉雕“万里长城”震撼面世，亮相岫岩，更有大胆评价为“世界玉雕之最”者。此前国宝级大型玉雕数来有二，元代“云龙大玉海”和清代“大禹治水图”。“云龙大玉海”为元世祖忽必烈于1265年令皇家玉工精心琢磨，历经数年雕刻而成。玉材选自新疆和田地区的高等级玉料，作品重量为3500公斤，后来年代里历经飘零，藏身京城庙宇。清代乾隆帝重金使之购回，亲题御诗三首镌刻于器膛之内，展于京城北海团城之上。

“大禹治水图”巨型玉雕的玉材同样于清代乾隆年间选自新疆和田，利用冬季淡水冻冰成路，“日挪卧牛之地”运至京城，历时6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雕成，置于宫内珍宝馆。“大禹治水图”玉雕重5000公斤，高224厘米，宽96厘米，与“金缕玉衣”“马踏飞燕”“曾侯乙编钟”“清明上河图”等被评为十大国宝重器，更名海外。

在辽宁岫岩面世的当代巨型玉雕“万里长城”采用岫岩花玉，由30余位“油派”玉雕大师和技师使用玉界著名的“油岩工”，历时14个月，在一件单体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原石上反复设计精雕细琢而成，其长度6.5米，高过3米，厚近4米，最大周长近17米。《万里长城》采用立体雕、镂空雕、深浮雕、透雕等技法。

我国玉文化领域经历了漫长的磨炼摸索。曾有学者把玉器发展史分为“神玉时代”“灵玉时代”“巫玉时代”“礼玉时代”和“民玉时代”。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治玉选材、手法、技巧逐渐形成个性化的风格。明代的苏工，明清的海派与扬州工和清朝造办处玉工，以及清末民初的广州十三行玉工等，均各领风骚，形成各自独门手艺。岫岩工在百工门派中脱颖而出，鲜明亮丽，个性十足，自成油派而后来居上，被称为玉坛奇葩。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巨型玉雕《万里长城》的总雕刻师孙立国在评价“油岩工”时强调，玉界推崇的“油岩工”由来已久。“油派”明期立世，技法丰富，古朴典雅，华美大气，稳重匀称，自成体系，承前启后。他介绍，“油派”以立体圆雕、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及镂空、透雕等技法见长，因料施艺、刚雕去粗，又多方借鉴当地木刻、石雕、泥塑、剪纸、刺绣和彩绘等创作精髓，尤其使用了与其他派别不同的工具，使艺术表现力更加饱满突出，充满活力。有玉界专家指出，“油派”巧妙运用艺像空间概念，极尽发挥俏色巧雕等技法。这些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在巨型玉雕《万里长城》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显恢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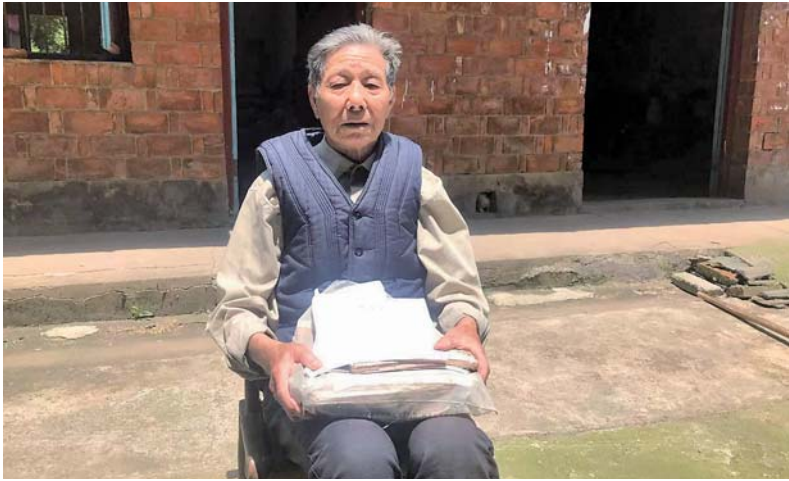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介绍，在距今8000余年前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异常精美的黄玉珠，就是采用了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岫岩玉。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在我国东北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等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均出土了岫岩玉材质磨制而成的高等级玉礼器及饰品。汉初《尔雅·释器》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玕珠焉”。晋代郭璞曾注释“珣无闾，山名，今在辽东。珣玕珠，玉属”。其“珣莹，美石也”。

在我国诸多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发掘中，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齐家文化，分布形成史前古玉文化的六大特色板块，分别构成高等级玉礼器的核心玉文化。

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有其重要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在辽东小珠山遗址出土了三件蛇纹石玉饰品，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出现的最早岫岩玉器。著名古学家、满城汉墓的主要发掘者卢兆荫先生曾评价指出，在著名的国宝“金缕玉衣”上玉片使用的玉材即蛇纹石玉，很可能产自岫岩。由此可见，在汉代以前，新疆和田玉并没有大量进入中原成为高等级核心礼玉，而是地方玉与岫岩玉形成天下高等级礼玉或葬玉、赏玉的格局。有学者细致地考证，精确取之玉象，尚黄尚白，以土为德。而岫岩玉精灵四射，莹光剔透，象近上苍，应该是高等级礼玉之首选。

汉代以前墓葬中的礼玉多为蛇纹石玉玉，尤其为高等级墓葬中所多见。如红山文化的玉龙，凌家滩文化的祈祷玉人，石家河文化的玉蝉，良渚文化的玉饰等等。汉代以后，西域凿空通商贸易，新疆和田玉料源源不断进入中原，逐渐取代地方玉和蛇纹石玉，一改用玉等级，形成了用玉时尚，建立起以新疆和田玉玉器为核心的审美取向，天下随之。从此，地方玉及其蛇纹石玉淡出玉器核心。蛇纹石玉滑向二流玉材，低迷至今。

近年来，不少文化研究者面向岫岩，钟情岫岩玉，唱好“油派”，明确岫岩玉的国石地位，指出岫岩玉在我国玉史传承中的特殊贡献。著名的矿玉石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时麒最近就指出，首先国人要扭转对岫岩蛇纹石玉玉的偏见，要看岫岩玉的冰清玉洁之处。他强调，世界上那么多蛇纹石玉产地，但只有我国岫岩地区的岫玉精料品质是独一无二的完美，通过“油派”精雕细琢，达到意想不到的灵动美感。有句老话叫“笔墨当随时代”。巨型玉雕《万里长城》的问世，让当代玉文化跨步向前。同时也盼望“岫岩山，山山出玉”的佳对在我们这个时代完美出现。



▲ 90岁的熊善初老人抱着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及个人陈述书等资料。 本报记者袁汝婷摄



▲ 档案记载的常德细菌战第一位受害者12岁的蔡桃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惨绝人寰，给常德人民、中国人民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我们不能忘却今天安宁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铭记历史，呼唤和平，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本报记者袁汝婷、席敏

1941年11月4日，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日军飞机正在低飞盘旋。

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被布条塞紧窗窠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后，有人将这些东西扫拢来，足有四五百斤。几天后，家住城中心的蔡桃儿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潜入她的身体。

11月11日晚，蔡桃儿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日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蔡桃儿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卷土重来，戕害常德大地。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日本投降74年后的今天，这里有一群老人，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经历。他们说，害怕自己走了以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

鼠疫蔓延：死亡不止7643人

蔡桃儿去世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畏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呕血、咯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

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日，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无数家庭因此家毁人亡——

现年87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埋在乱葬岗上。“奶奶不敢发出声，就用毛巾捂着嘴哭，直到捂出了血。”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四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

受害者亲属回忆，1942年春天，处于疫情高峰期的常德城内，夜间总有人穿行街巷，喊着亲人的名字哭嚎。有人哭瞎了双眼，还有人精神失常……张礼忠痛失亲人一个月后，鼠疫病菌寄居在小贩李佑生身上，蔓延出城。

1942年5月4日，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现马鬃岭镇)，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日死亡。李佑生的小女儿李玉仙回忆，短短几天，接触过高烧的多名亲属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发病时间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死得惨。葬事无人办，棺材无人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毛根直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

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繁华。今年90岁的王华璋曾居住于此，他是目前仍在世的极少数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之一。

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璋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了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娃娃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我不敢进去。”

短暂的停留，让王华璋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力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璋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力士的救治。

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我们才听说了鼠疫。”王华璋说。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今年90岁，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多家店镇。“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生命里。“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

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一方面，法律认定受害有极其严格的标准，7643人皆有姓名、有详细病程，且有后人遗属为证；另一方面，对受害者的调查1996年才正式启动，56年过去，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害——

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没人留下姓名；长岭岗乡神师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

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

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间化作了“瘟疫之城”。

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

83岁的遗孀李明庭记得，疫情高发期的某一天，城西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烧塌了。

对日诉讼：“让东京听见我们的愤怒”

2002年7月18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赶到了邮局。当时，她是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而她的怀里，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两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

历时5年，开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一濑敬一郎在电话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后，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邮局年轻的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三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两千多元，却要历时40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大白纸，粘在纸箱上，用黑笔写了一段话：

“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

花了2230元邮费，声援签名被寄出。陈玉芳内心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来不及了。”

大约8天后，她接到了一濑律师办公室中文翻译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不可能吧！是我们的签名吗？”她难以置信。

电话那头，翻译将纸箱上的话一字一句念出来。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

许多人都在为这次诉讼提供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之支持。

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其中既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有受害者遗属。声援团需要坐火车抵达上海，再从上海飞往东京。

可是，从湖南怀化通往上海、途经常德的火车每天仅有一趟，留给常德的卧铺指标仅有6张。声援团的同志来到火车站提出请求，对方也犯了难。就在这时，巧遇一名怀化火车站的负责人前来沟通工作，被引荐到陈玉芳的办公室。

“我把声援团为什么要去东京一五一十告诉他。他只说等我消息。”陈玉芳回忆，不久后，这名负责人给她打来了电话：“陈主任，我们给声援团另外挂一节卧铺车厢。你们一定加油！”

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声援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传单，正面是受害者满目沧桑的照片，背面是一篇文章，题为“让东京听见我们的愤怒”。

飞机起飞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起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

声援团的成员张礼忠回忆，过了一会，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们。”“成员们都不说话，空姐又说：“机长说了，交给我们，我们帮忙发。”

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传单发到每位乘客手中。几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等其余乘客下机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

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

时隔17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

问陈玉芳“去游行要不要喊口号”。“等真的走上街头，这些平时很沉稳的人，一个个冲在最前面，拉都拉不住，手臂挥得比其他人高。”一位受害者遗属回忆。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罪行。”这也许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我们的愤怒。陈玉芳说。

共同坚守：反人类罪行不能被忘记

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如何得来？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院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陈玉芳说，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70%。铁一般的证据背后，是一群老人的坚守——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

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镇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

今年79岁的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发人瘟”，不知是鼠疫。

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刺痛了徐万智，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沉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

就这样，一批像徐万智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路途遥远的一天骑了100多公里。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搜集。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花甲，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好，却靠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万份受害者调查材料。

“当年做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几岁了，还有好些人，去世了。”说完这句，现年87岁的张礼忠沉默良久。

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如今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两人——97岁的王华璋和90岁的熊善初。

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那是细菌战对日诉讼二审开庭，他来到东京，在日本法庭上做了陈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桥村有73户、152人感染鼠疫死亡。

陈述书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了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法官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然而，怀着巨大伤痛与愤怒的熊善初、王华璋、张礼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复——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这还远远不够。

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智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